

在一個世紀前，中國與西方的思想交通史上，發生了幾件有意義的事。

先說明一下當年的設境。

1917年，俄國革命成功，推翻了沙皇的統治。

1918年，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。有人稱之為“大瘋狂”。許多人喪失了生命，經濟衰退。美國走向世界舞臺的前面。

在中國，1911年，推翻了積弱的滿清皇朝，但陷入了軍閥割據的亂局；思想潮流，把儒家和孔聖人一同掃地出門，卻沒有代替的定於一尊。

杜威(John Dewey, 1859-1952)於1919年，到日本安息年休假講學。他的門弟子胡適(1891-1962)，是北京大學文學院教授；經過校長蔡元培同意，請他順道來華。

在此之前，美國在世界學術上，沒甚發過聲音。

起初，杜威只想在中國游歷幾週，就回去教書了。哪知在華竟然大受歡迎；北大校長蔡元培，尊稱他是“洋孔聖人”！那就不能不周游一番，於是應請延期留華。

適逢第一次世界大戰告終，中國參加“協約國”是贏家。中國本就不奢望分啥贓，但竟然被分贓一協約國同夥的日本，要接受戰敗國德國在山東半島的利益！北京政府傾向簽讓；代表團不甘。學生停課上街游行，反對政府軟弱妥協，聲稱維護國權，打倒國賊！誰是“國賊”很難確說，總是不乏打倒的對象。

杜威在美國的哲學圈子裏，屬於實用主義——其好處就是卑無高論，適當的顯例就是錢幣：實用就是真的。至於對誰實用，範圍多廣，能用多久，無以定論；再說到如何來，如何用，更非所計。中心的東西既然不多，就得衍東及西；談到教育理論上去，通俗引興趣的現實政治，難界定的口號，像“民主”，“自由”，“科學”等類。

學生們很容易受鼓動，跟着喊口號，搞運動。其中夠動人的是“××救國！”“××不忘救國！”

杜威在亞洲(Asia)學報寫文章，稱此類風氣為“室內運動”！當然不是解決問題，可是消耗時間很有效，而且後人一直可以用來當話題，就像“烏托邦”一樣，能搞上許多代；地不分東西，立場保守自由都可以，想反啥，或搞啥，隨時搬出來作標語，打旗號，不虞匱乏。既然沒有確切定義，那就不怕會過時。這是可見的影響。

羅素 (Bertrand A. W. Russell, 1872-1970) 來華，當然不是專程取經。經歷中國後，他說：

我理解白人並不是我曾設想的那麼重要。如果歐洲和美洲在戰爭中自我毀滅，人類不會絕種，連文明的結局都不是。仍然會有相當數目的中國人存在；在許多方面，中國是我所見最偉大的國家。不僅是最多的數目，最偉大的文化，在我看來，更有最偉大的才智。我不知任何文明，思想如此開放，如此實際，如此的願意實事求是，而不把事實扭曲為另一種模式。(Interview in *New York World*, May 4, 1924. Will Durant, *The Story of Philosophy*.)

羅素在百年之前，能有如此認識，幾乎可列先知。要知道那時的中國，被認為最沒有希望的國家；連國人都有這樣的看法，惟知崇洋。只少數人例外，像辜鴻銘那樣認識有國魂的人。

還有一事，就是在這時期，羅素的轉變。

此人出身英國的貴族門第，頗有才華。在學術方面，以數學及邏輯學傑出；當愛因斯坦的“相對論”，如同橫空出世，羅素是少數幾個能懂，並可以發為論述的人。只是品德不修；他以世界為瘋狂，世界以他為瘋狂。

西方世界擴張時代的“3-G” = God, Gold, Glory，即是所謂“金榮神”，他都冒犯了。羅素成羅輸。失去了大學的教席。1918年，因反戰還進過監獄。

人群為何而戰？(*Why Men Fight?*) 他指出，一切私有財產，都是源於強暴和偷盜；解決之道，在於實行“共產”一柏拉圖“共和國”模式。

帝國主義老大哥，以種植鴉片和走私起家，哪容得下如此狂悖的言論，簡直是不道德，跡近反叛！因此，美國大學講演的門向他關上，聯合抵制他。他到所嚮往的俄國去，發現缺乏言論自由，沒法子呼吸。於是他到了中國，從南到北，走了些地方。

羅素受到歡迎，但不夠吸引人。中國尋求速強丹藥；他不是背着藥囊的江湖人。但他認為中國有自己的文化資產，不必捨近求遠，追求全盤西化。

其西方哲學史 (*A History of Western Philosophy*)，獲 1950 年諾貝爾文學獎。羅素在書中說，他對於杜威，幾乎是全部認同；溫和的說，唯一的歧異是杜威尋索真理，以“尋索”作為“真理”。這溫和批判很重要——杜威的跟從者，也該思索：實用主義者，是否重商

主義披上了“哲學”的外衣？有以“現金價值”為真理的可能，而步入“實”和“用”的歧途？

史學家篤倫(William Durant, 1885-1981)對羅素似乎頗為欣賞：“他不是宮廷人物，但是真確的學者和紳士，並且比把‘基督徒’挂在嘴上的人，是更好的基督徒。”他更期望羅素能走出失望，進入智慧，在將來寧靜安詳的“哲學家族群”中，列名最高。

當然，史學家不是基督徒，也未必以基督徒的立場講話。那是否史筆刊論，基督徒該好好思想；能作衛道家更好，可不要只在嘴上。

康德(Immanuel Kant, 1724-1804)被人稱為“偉大的支那蠻”，是因有人以為他把中國思想西化。

他談的“永久太平”，和“天理良心”，反對掠奪戰爭等倫理觀念，有濃厚的中國色彩；可能是近代如此認識的西方第一人。在他一個半世紀後，羅素的思想，是否基本上受康德影響？

德國前總理史密特(Helmut Schmidt, 1918-2015)，與中國關係密切。在與中國領導人鄧小平(1904-1997)談話時，他當面奉告：我看你像是信奉孔子。鄧不以為忤。鄧原名希賢，可見其與中國傳統文化的關係。

如果曾有制式共產主義，現在已經沒有了。蘇聯不僅解體，現在的俄國邦集，連旗號也換了；挂名共產黨員剩下不足二十萬；比美國多不了幾許。算來蘇聯存在不過是七十年，恰符先知耶利米預言猶大國被擄的年數。

中華人民共和國於1949年建國，到七十年後，實際上是在走“儒家社會主義”的道路；該算是從小康走向大同，希望不再倒退。現在沒有誰再批林批孔，反而到處尊孔，向全世界推銷孔教學院。對人民來說，是從大清退位以來，沒有軍閥存在，社會進步，民生樂利的昇平年代。

歐洲許多國家，大致是“民主社會主義”路線，程度細節各有不同。不過，仍然在美國軍工商勢力裹脅下。實用主義，不難蛻變成爲“現金哲學”。

基督徒應植根於基督的真理，不被甚麼風吹動，遵守主的道，並以教訓人，道化文化，直到主臨。阿們。

作者：于中旻
©2025 James C. M. Yu

聖經網
aboutbible.net